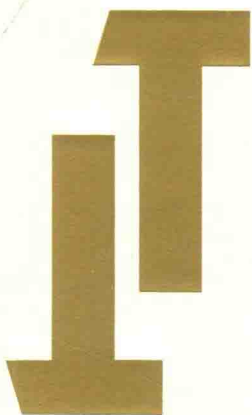


南大智库文丛
李刚主编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 Tanks



美国政治的转变

新华盛顿与智库的兴起

[美] 戴维·M.里奇 著

李刚 邹婧雅 王爽 等 译

谢馥兰 校译

David M. Ricci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大智库文丛
李刚主编

美国政治的转变

新华盛顿与智库的兴起

[美] 戴维·M.里奇 著

李刚 邹婧雅 王爽 等 译

谢馥兰 校译

David M. Ricci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 Tanks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政治的转变：新华盛顿与智库的兴起 / (美)
戴维·M. 里奇著；李刚等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

(南大智库文丛 / 李刚主编)

ISBN 978-7-305-19458-0

I. ①美… II. ①戴… ②李… III. ①政治—研究—美国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0160 号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 Tanks

By David M. Ricci

© 1993 by Yale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6-47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智库文丛
主 编 李 刚
书 名 美国政治的转变：新华盛顿与智库的兴起
著 者 [美]戴维·M. 里奇
译 者 李 刚 邹婧雅 王 爽 等
校 译 谢馥兰
责任编辑 张 珂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33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458-0
定 价 69.8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大学与智库”

——“南大智库文丛”总序

中世纪的大学是学者的行会，传道授业是最基本的使命，也是教授们谋生的手段。柏林大学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先河，成为现代大学的原型，但是由于曲高和寡，它被人们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二战以来，美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着眼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服务社会列为大学的第三个基本功能。智库作为现代社会从事战略和政策研究、咨询的专业机构，是现代政治运作、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综合需求的产物，是知识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产物。大学不等同于智库，这是一个常识。一般而言，大学的历史要比智库悠久得多，大学的体量要比智库大得多，大学的结构和功能要比智库复杂得多。大学和智库的关系本来并不复杂，但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有学者惊呼“高校就是高校，不能把高校建成智库”，一时间大学和智库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很有必要对大学和智库的关系做系统的讨论。

—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和智库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机构。虽然大学不是智库，但是大学和智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密切到难以分割。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元，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重中之重。对于智库而言，政策问题的咨询和研究是基本运行单元。当然学科取向和智库的问题导向研究本不应该对立。学科具有二重性，根据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的论述，一方面，学科是知识分类的结果，另一方面，学科也是现代社会知识再生产的规训制度体系。例如理工农医等学科分类，一方面这是现代社会知识的分类体系，另一方面现代大学也是按照这个体系进行人才培养、

研究基金分配和各种学术资源的组织。但是这种按照知识主题领域的内部结构聚类的分类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进入信息社会后,大量前沿的知识领域已经无法纳入传统的以主题为分类依据的“学科”,所以出现了“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概念。大部分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科”都是问题导向的。智库研究和咨询有专业领域的分别,比如外交智库、科技智库、社会智库等,智库的专业领域和学科分类有一定关系,但是,智库的研究和咨询是无法局限在一个固定学科范围内的,智库研究和咨询是问题导向的,解决问题需要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方法和技术。但是,我们又不能割裂智库和学科之间的联系,因为好的智库研究咨询一定有自己的学科背景,智库研究的大量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往往来自特定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都为智库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概念和分析范式。比如,“软实力”、“SWOT”、“文明冲突论”、“现实主义战略论”等智库经常用的概念都来自特定的学科。

有人认为,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高校智库就对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指手画脚,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一种知识的不诚实。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当下的许多智库而言,这是非常及时的提醒。中国古代“士”阶层有强烈的济世情怀,有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看成是最风流潇洒的事业。这种古代智囊的遗风很容易被当代智库继承,所以当代中国智库需要警惕的是浸染古代智囊不调查不研究,信口开河的不良风气。现代智库强调循证分析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体现,是某一领域长期知识积累后的发现,提出的政策建议出于“知识的诚实”。

学科发展促进智库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美国。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卫星,这对美国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让美国全面反思自己的教育体系。1958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要求大力推动科学、工程和外国地区研究,并为这些学科提供巨额经费支撑。此后美国的地区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对中国的研究也得益于《国防教育法》,在费正清的倡导下,美国的“中国学”学科渐成气候,西方传统汉学没落,着力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 and 文化的中国学学科成为主流。在中国学学科

范式的熏陶下,一代又一代学人不仅占据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国研究院系的教席,而且“中国学”也成为智库中“中国问题政策分析”的主流范式。2007年,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几乎所有华盛顿区域的智库都有一人或者多人全职或者半职研究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他列举了30位工作于智库的中国学研究专家,这些专家在他看来都是可以 and 大学教授平起平坐的专家。他说:“正是这些在学术机构和智库的研究人员共同催生并推动了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这一领域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智库史专家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捐客》里把智库专家分为六类,第二类专家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人。他认为:“这些人可以称作‘政策专家’,属于这个领域的学者通常将更多的时间致力于政策研究或者教学上而不是政策制定和全职顾问。无论是通过融入政策的理论洞见,还是培养继续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学生,他们的工作或许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人一般工作于大学的研究中心。”我们认为,这类政策专家从事的是“学科”层面的工作,他们的使命是为智库的实务生产概念、准备理论、锻造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及其分析范式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概念为智库分析国家综合国力提供了崭新的超越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特提出的竞争战略分析框架被许多战略研究智库用来分析国家竞争力。这都是学科突破促进政策分析的经典案例。这也解释了为何一流智库专家大多出身于一流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因此,越是一流的政策学科,越是一流的政策专家,越是能够促进智库的分析和咨询能力。

大学也是智库人才的摇篮。智库的人才从哪里来?全部靠自己培养吗?世界上的智库除了兰德公司有自己专门培养政策分析师的研究生院外,恐怕没有其他智库自己培养智库人才。当然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中国智库也培养研究生,但是他们的研究生大部分都不是针对公共政策研究需要的,和兰德还是有区别的。那么,智库的人才显然主要来自大学。据调查,美国著名大学社会科学类的研

究生中 45% 首选到咨询公司和智库工作, 特别是政治学(美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政治学, 这和中国不一样) 研究生把到华盛顿著名智库实习和工作当作未来从政的终南捷径。

中外许多著名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很强, 到智库中从事政策分析工作显然是大学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的一个重要出路。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一直是所谓的“学科建设取向”, 对大学而言, 衡量一流学科的指标是核心期刊论文、专著、项目、博士点的数量。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为智库所用, 是不是智库所需要, 这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大纲, 不难发现, 没有多少课程是专门为智库等政策分析部门服务的。令人忧思的是当代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过分强调一级学科建设, 造成对“学科”的理解过于狭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国家标准 GBT_13745 - 2009), 我国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有: 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民族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科学、统计学等学科。因为过于强调一级学科建设, 许多在西方大学里显赫的学科在中国的一级学科中就无足轻重了。比如, “区域研究”是西方大学中普遍设立的学科, 是培养博士和硕士的重要平台。而在我国像“非洲研究”、“印度洋研究”等区域研究在我们的学科分类中很难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中出现, 属于所谓的三级或者四级学科, 因此许多高校认为区域研究学科层级太低, 对一流学科建设贡献度不大, 不会给予独立的学科建制。对于全球化治理任务日益繁重的我国而言, 这就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后果: “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开展的沿线区域国别研究明显不足, 相关人才匮乏, 知识供给滞后。同样的, 区域研究的智库人才也无法及时补充, 雇用的研究人员都是从其他学科“改行”而来。大学学科建设如何满足智库人才需求是值得大学关注的问题。

二

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目标。2014年10月27日,《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交“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智库建设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2015年1月20日,中央两办正式印发《意见》,揭开了新型智库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大学不会也不可能置身于这场新型智库建设的浪潮之外。的确,大学不是智库,但是大学可以培育智库,而且能够培育出很好的智库。发挥智库作用是哲学社会科学几大功能定位之一,而新型智库则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机构。大学既不能混淆学科与智库的区别,也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必须形成学科建设和新型智库建设螺旋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学科是大学教学、研究和知识分类的基本建制,迄今为止仍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西方大学里培育优秀智库的案例并不少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本身就是培养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著名机构,该学院下属的贝尔夫中心等机构都是美国顶级的智库。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也是顶级的智库。近几年我国大学里也培育出了若干个著名智库,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研究院、复旦大学的发展研究院、中山大学的粤港澳研究院等。

但是大学办智库也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大学对培育学术型研究中心的经验和模式有路径依赖,因此很容易用建设学术型研究中心的思路来培育智库。大学学术型研究中心与智库最大的区别是学术机构关心的是教学和研究,研究成果的主要去向是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和学术出版社;而智库关心的是通过研究、咨询和传播活动影响政策共同体或者影响公众舆论,对于智库而言,大部分研究项目从启动之日就明

确了目标受众。当然自由研究在智库中不是没有。据华盛顿发展绩效研究所前董事长大卫介绍,他们研究所鼓励员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做不带任务的自由探究。布鲁金斯学会也给予资深研究员自主选择课题的自由。但是智库的自由研究不可能离开智库的大盘子,“如丸走盘”,自由选择是受智库的专业领域限制的。

大学培育智库时,往往受到学术机构建设的惯性思维影响。因此,虽然当下我国许多大学的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在向智库转型,但是转型成功者不多。主要原因是观念认识不到位:对智库本质认识不到位,对智库运行模式认识不到位,对智库产品设计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智库传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大学研究中心产出相对单一,而智库的产品(productions)则包含研究报告(表现为各种出版物)、咨询服务、活动(智库主办的各种会议、论坛、听证、调研等,本质上是智库利用自己的专家、场地和品牌提供的服务)。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了292场活动,2万多人参加,并举办了110场在线讨论,有5.9万人参加。恐怕我们任何一家大学的研究中心都不可能办这么多活动。如果智库局限于研究工作,以研究报告为主要产品,那么,这种智库和大学研究中心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大部分智库都是此类性质,因此很难称其为“智库”,这是典型的“智有余而库不足”。

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向智库转型的困难之二是缺乏熟悉智库业务的营运人才,尤其缺乏“政策企业家”。大学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长于思考与写作,但是运营能力严重不足。办事、办文、办会都非其所长。一旦让教授们运营智库,如何处理好与政府、媒体、客户之间的关系,如何从事智库内部的管理,这些对他们而言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教授运营智库会存在很长的不适应时期。

例如,电视普及后,智库专家主要承担“政策解读”角色。而现代媒体已经从狭隘的新闻报道转向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分析,为适应这种趋势,媒体不仅需要更专业、拥有更好教育背景的记者,同时也更倚重专家的力量。现在公共政策专家、公共知识分子与记者和编辑已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他们在报纸专栏、广播新闻项目

以及从电视衍生出来的访谈节目中找到了机会。报纸和电视新闻记者依靠这些专家来使每天的新闻报道更具深度,体现多样性并实现观点上的平衡。实际上,寻求争论本身就已经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将这些专家带到了聚光灯之下,他们作为权威人士对各种社会热点做出评论。这种角色对于习惯于象牙塔的大学教师们而言并非易事。

成功的智库领袖往往都是“政策企业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机构建设。他们调用资源来推进一个特定议程的实现,或者是促成不同研究者和行动者之间的联合,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或是将可造之才送入政策精英团队之中。他们往往领导一个强大高效的运营团队,把智库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据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张怡副院长介绍,复旦发展研究院有一支由20余名国内外知名大学硕士组成的运营团队。正是团队的高效运作,才使得复旦发展研究院能够整合整个复旦的社会科学专家资源。南京大学的紫金传媒智库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包括秘书长闵学勤教授在内的5人专职+10余位硕士生兼职的运营团队,这个运营团队一年中完成的活动已经有30余场,其中包括很多大型活动。

大学培育智库的第三个障碍是人才评价体系。大学为了满足学科建设取向的需要,尤其是当下“双一流”的建设热潮,对事关学科发展的指标非常重视,甚至不惜推倒对教授的长聘制度,全部教员纳入合同制管理,三年一个周期进行考核。对于许多还没有晋升到教授岗的教师而言,高层次的项目、一流期刊论文、高级别奖项和各种人才奖励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大部分智库性成果并不是晋升教授的依据。

总而言之,大学想培育出优秀,甚至世界一流智库的道路是曲折迂回、遍布荆棘的。但是大学是不是就应该放弃培育智库?非也。大学发挥智库功能是大学服务社会、服务政治的需要,尤其是著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很强,是国之重器。培育优秀智库是大学的义务,也是大学的责任。大学教授从象牙塔旋转到智库,经过智库的洗礼再回到研究机构,视角和体会都会不同,教学和研究都会变得更接地气。

三

1932年,罗家伦在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校长的就职演说中,以“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来定位学校的使命。时光荏苒,南京大学虽几经变革,但与时代、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的追求却始终未变;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瞄准世界一流、追求卓越的思维始终未变。

南京大学在中国智库史上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今天看来,这也是大学和媒体发挥智库功能的一个经典案例。10余年前南京大学提出了研究型大学“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确立重点学科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研成果;一方面融入国家地方创新体系,着力提升一流社会服务水平。在“顶天立地”战略的指引下,南京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通过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在不断提升研究层次和质量的同时,充分发挥哲学与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大多处于我国前列,实力雄厚。南京大学认为这种优势地位不仅不应该削弱,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离开学科发展,高校智库建设往往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践也证明,南京大学在国内外有良好声誉的智库都以强大的母体学科为依托。

南京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拥有国家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2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4个,其他省部级研究机构25个,校级研究机构99个。研究机构众多也意味着存在专业领域细分化,决策研究“散兵游勇”化的现象,影响了南京大学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发展水平。南京大学根据教育部“并非所有的高校科研机构都要变成智库,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重点研究基地都变成智库。而是重点研究基地可能有一批要转型升级发展为专业化的智库,还有一批基地要发挥好智库功能,但并不要求向专业化的智库发展”的指示精神,提出重点建设江苏发

展高层论坛、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风险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与和平学研究中心、长江产经研究院、江苏紫金传媒智库等国家急需、学科雄厚、团队力量强的研究机构,并促使它们向专业化智库转型。南京大学要求智库化建设的基地彰显现代智库的专业化:一是准确的功能定位,智库就是智库,不要过多承载其他非智库职能;二是明确的专业领域和方向,南大重点建设的智库都不是综合智库,都有明确的领域和方向,综合智库职能由南京大学整体承担;三是逐步形成的专业化的资政研究队伍;四是符合现代智库建设要求的治理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

陈骏校长指出在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课题中,“南京大学要以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己任,不断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大力推进原创科研,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南京大学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开展校内外协同创新,结出了丰硕成果。

2015年4月,南京大学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正式组建了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该中心以信息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创新团队为核心,积极开展智库研究和平台建设,并为江苏省有关部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咨询服务工作。“中心”联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的专家,集中力量攻关,开发的“中国智库索引”(CTTI)已经于2016年9月28日正式上线。2017年,又开发了“中国智库索引”(CTTI)二期工程,二期开发完成后,CTTI将变成集智库搜索、智库数据管理和在线智能评价功能为一体的集成信息管理系统。除了系统开发外,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还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成为我国第一个设立智库研究与评价博士生培养方向的单位。中心已经培养出2名智库研究方向的博士,另外在校的5名博士生都以智库研究和评价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南大智库文丛”是南京大学整个智库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战略性的安排。它将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坚持高品位、高质量、前瞻性、实践性的遴选标准,不仅汇聚南京大学的智库类出版物,而且面向全国、面向国际接纳一流的智库成果,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打造一个新的智库出版品牌。

2018年“南大智库文丛”推出的4本著作中，除了笔者的《智库评价理论与方法》外，其他3本都是翻译作品。耶鲁大学出版的美国智库研究名家里奇的《美国政治的转变：新华盛顿与智库的兴起》讨论了智库与美国政治转型的关系。美国政治的复杂化、多元化和知识密集化使得美国政治家只凭常识、直觉、经验、手腕和良知已经无法自如应付，智库作为专业的决策咨询机构成为华盛顿新政治的有机构成。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了25年，但是其中的主要分析和结论都经历了岁月的考验，证明了它在智库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兰德公司(1989—2009)：美国战略学知识的重构》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可以说是智库案例研究中的样板。作者是法国人，善于理论思辨的法国战略学者，通过考察兰德公司在冷战以后的思想理念、运作模式、研究方法的调适与变化，分析了美国整个军事战略学思想与体制的重构过程。冷战以后，美国军事思想的想象力并未枯竭，反而呈现出颠覆性创新的新特质，同时，以计量为特征的军事规划与管理工程的传统得以延续。可以说，后冷战时代美国军事战略学的重构与美国军事叙事学的“神学化”不仅定型而且正在进化之中。这本书的价值已经超越智库研究界，对军事与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智库、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实现影响力的路径》是一本世界智库研究文集，11篇极具功底的专题论文对各国的外交智库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本书英文版刚出版，我们就拿到了中文版的翻译授权，可以说这本书是海外智库研究成果的最新速递。

“南大智库文丛”2017年推出三本书的选题、翻译、编校和出版质量得到了业界的肯定，我们希望今年这4本书能进一步扩大“南大智库文丛”的影响力。

新时代、新气象、新征程，新型智库是新政治的新元素，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任重而道远，大学应做出更卓越的贡献！

李刚 修订

2017年11月2日

《美国政治的转变》各章节译者

翻译章节	姓名
第一、二章	王 爽
序言、第三章	邹婧雅
第四、五章	甘 琳
第六章	王 琪
第七章	冯嘉慧
第八章	丁 怡
第九章	谢馥兰
索 引	丁怡、甘琳、王琪

序 言

当代社会,讲故事往往是解读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众多学者认为,每个人都是通过聆听和讲述各式各样的故事来试着理解自己的生活与所处的环境。例如,从《约伯记》到《麦克白》,从《安提戈涅》到《安娜·卡列尼娜》,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玛格丽特·桑格的传记到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和伤膝河惨案的历史。大部分持这个观点的学者都从原则上深入思考过讲故事这种方式,并在思考过后对其加以赞扬和推崇。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人就哪些故事应当被美国收入学校教材这一问题持有不同见解。因此,现代社会产生了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斗争以及何为“政治正确”的争论。

《美国政治的转变》并不偏袒争论中的任何一方,但它将理论诉诸实践,亦如本书的副标题——“新华盛顿与智库的兴起”所示,通过讲述大量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马克思、米尔等伟人的故事,以此阐明一个重要的主题——华盛顿智库。近年来,智库的财务预算日益增长,吸引越来越多知识渊博的人员,并且举办接连不断的活动,它们在美国近来的政治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事实表明,这一主题理应受到关注,但事实本身并不一定能凸显其重要性;因此,讲故事的方式在这里就派上用场了。在本书中,我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你讲述一些故事,告诉你华盛顿智库的活动是否能够产生智慧、如何产生智慧,以及公民是否应该就此相信这些智库对公共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书的第一章将更加详细地介绍这些故事以及它们对智库的影响,但我希望能够事先说明本书没有谈及的一些内容。例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亨利·基辛格实际上都是智库人士。戈尔巴乔夫担任莫斯科社会政治研究基金会的主席一职,基辛格出任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顾问。由于在智库领域工作的名

人极具吸引力，读者们往往会因此产生诸多关于智库的问题，但我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出于好奇心，人们往往想了解智库的人员、活动、资金赞助者以及他们对政府官员和政策决定所施加的影响。如果一个作者想要去回应这些问题，他/她就会详细地介绍智库的各个方面。例如，谁在哪写了某本书或某项报告，谁受邀在某个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以及为什么，谁出于什么原因在某个电视新闻节目上担任评论员，谁以何种方式募集到某笔智库资金，谁因此欠了某个政党或某个派别的人情，谁对他人提出的某些观点表示赞同，谁在华盛顿的个人影响力促使政府制定了某个联邦政策……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成为被阐述的对象。

本书几乎没有着眼于这些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华盛顿智库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现今智库运作的政治体系。透过这一视角，我们将会看到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是在美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趋势的混合作用下得到演变，这些趋势催生了大量类似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EI)这样的智库。当我们追溯这些趋势的发展时，可以发现，粗略来讲一直到1970年，华盛顿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智库，但随着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开展全国性运动，抵制那些他们认为威胁到美国精神和物质福祉的政策和生活方式，智库便开始繁殖扩张。

随着保守派运动高涨和自由派做出回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智库，它们在今天的华盛顿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我将探讨其中一些作用以便解释这些智库究竟在做什么。一旦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我将阐述哪些智库活动对社会整体是具有价值的。在整本书中，我将重点讲述当今的美国是如何营销思想，并且通过许多伟大的故事论证，在华盛顿内传播的智库思想总体对于社会长期寻求的政治智慧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政治的转变》并不涉及太多大众感兴趣的智库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那些问题不重要。总的来说，人们对智库内部和周边发生的事情、都有谁参与其中、又是谁在华盛顿的政治喧嚣中引领风骚这些问题感兴趣显示了他们的政治直觉，

这再正常不过了。毕竟,独家新闻、事实真相、泄露的秘密、最新的内部消息、高层的绯闻及低俗的流言,这些东西往往自然而然地会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这也就是为什么报纸和杂志在报道布鲁金斯学会、政策研究所(IPS)和传统基金会这类机构时,总是喜欢在文章中编造或暗示一些这类信息。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学者不像记者,作为一名学者,搜寻这类材料并不能够充分认识智库。大费周折地研究那些传闻里的资料,其本质上只是在反复揣摩“城市的议论”,且这些议论只是片面之言,并不能从中得出有关公众人物及其参与的公共事务的可靠结论。因此,当你获得这些信息时,最大的难题并不是整合与政治斗争及其参与者相关的信息,而是分辨和判断哪些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信息。

例如,就智库而言,那些看似是事实的可能只是猜想,因为智库进行研究、推广成果、募集资金及建立政治联系的方式并非都能通过直接观察得知。对于这些情况,即使消息传播者重复讲述着同样的故事,其中关于智库具体的操作细节也仅是传闻。并且,许多大家能看见的智库活动,如情况介绍会、午餐会和大型会议等皆来去匆匆、不再重返,只是每次包含不同的参与者和成果。因此,一个谨慎明智的作者应该避免对智库举办的这些活动及其影响做出规律性论断。最后,许多智库的运作需要巧妙地选择数据,严密的论证而不是简单的证明,需要大量的修辞技巧和其他对智库运作来说极其重要却又无法衡量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即使公之于众也依旧模糊不清。

关于美国民主制度是如何造就了华盛顿智库的兴起,依我之见,首都的政治事业是无法预料的,其中参与者掌握的权力大小也无法衡量,我在书中将解释其中的原因。同时,我将着重解释为什么像布鲁金斯学会和 AEI 这样的智库在推广自己的思想时,无论这些思想多么具有感染力,他们从来无法确定那些无形的东西会对其他华盛顿人士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这些智库偶尔会登上新闻头条并引起轰动。在调查智库的过程中,不论是图书、研讨会、情况介绍会还是早餐会,我都密切地关注智库正在做什么。同时,我也访问了一些智库研究员和管理者,他们向我分享了自己关于智